



# 在地城镇建设的近代探索与当代启示

## ——卢作孚北碚模式的特色经验

杜洁 贾莹 温铁军

**[摘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方精英卢作孚在内陆山区的重庆北碚开展了逾20年的乡村建设实践。其秉持以民生为核心的“乡村现代化”理念,走出了一条兼具现代性与本土性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被誉为“北碚模式”。本文从北碚的城镇规划、产业建设、人的现代化建设、城乡治理四个方面对其历史经验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北碚模式跳出了大城市发展逻辑,以民生为核心,具有强烈的在地化特点,通过乡土社会与外来现代理念的融合创新,形成了在落后山区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城镇建设典范。其经验充分地内在于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探索的历史进程之中,对当下相关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关键词]** 城镇化建设;城乡融合;北碚模式

###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的、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sup>①</sup>。为贯彻这一发展方式,需要转变思维与认知方式,尤其不能简单地采取“缩小版”的城市建设思维来建设新型城镇,而需要基于县域基层乡土社会的发展脉络与特点开展建设。在近代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丰富经验中,著名社会企业家卢作孚对基层乡镇进行自救与重建的探索,形成了乡土社会与现代化、城市化相衔接与融合的实践与反思,对今日的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建设工作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基金项目]** 重庆市北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卢作孚爱国企业家精神及城乡建设历史经验研究”(GC-2022054)。

**[作者简介]** 杜洁,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讲师;  
贾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主任规划师;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

<sup>①</sup>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城乡区域的形成与西方城市化演进过程不同。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基层市镇通过贸易将周边农村与中心县城联结成一体,形成不可简单分割的县城城乡社会(卢汉超,2009)。与西方由城市提供工业产品不同,在乡土中国,“农村才是真正的货源地”(赵冈,2006:25)。因此,大部分贸易行为及其相关的社会活动是在“市镇内或是在包括别的邻近农村地方在内的相当广阔的范围之内进行的”(珀金斯,1984:147)。至明清时期,规模不同、数量众多的小城镇(在不同地区名为集镇、市镇、场镇等)广泛存在于县以下基层社会,与周边农村形成经济社会关系十分紧密的城乡融合区域共同体。施坚雅(1998:40-55)将这个共同体称为“市镇社区”,认为它既是以本地乡土为基础的经济文化场域,又造就了乡民的生活方式。

近代以来,外部现代化巨变打断了中国县域基层社会的原生发展进程,造成了城市与乡村发展脱节等问题。应对于此,涌现出各种重构中国城镇与乡村社会的本土化努力,其中既有借鉴西方现代城市化经验的探索,也有重拾中国乡治智慧的实验,形成了中国现代城乡转型的多元光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卢作孚率先提出“乡村现代化”理念,并于1927年开始在西南内陆山区,以今天的重庆北碚场(镇)为中心开展综合性乡村建设,取得了中外瞩目的成就。有研究认为,持续逾20年的北碚乡建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刘重来,2007:2)。从城市化发展方向和城镇建设角度,有研究将卢作孚在北碚开展的城乡综合建设归纳为“北碚模式”(张瑾,2005),以区别于当时模仿西方都市化建设思路的“上海模式”(张瑾,2003:334),认为其有助于思考乡土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创新可能。

本文以近代地方精英卢作孚在北碚地区的综合建设为案例进行分析,集中探讨在市场经济与城市化挑战下,其如何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内陆山区,融合本地特点,达成现代小型城镇建设与城乡融合发展。

## 二、卢作孚与北碚城镇建设简况

在20世纪初,北碚场还只是四川省巴县北境、嘉陵江畔的一个普通的小乡场,原称白碚,后改称北碚。它地处巴县、江北、璧山与合川四县交界处,随着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而重建,靠场镇贸易逐渐发展而成巴县沿嘉陵江的一处中心场镇<sup>①</sup>。北碚场由于地处江巴璧合四县交界“几不管”的嘉陵江三峡地区,土匪极为猖獗。因而,难以维持有效的商贸和社会治理秩序。1916年,应来往客商的强烈要求,时任东川道尹王陵基在此设立了治安联防机构——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营(由于机构名称经多次改动,下文统一简称为“峡防局”)。

<sup>①</sup> 当地农村中存在大量基层市场,较小的只能以墟场相称,规模较大的形成中心场镇。据清乾隆年间《巴县志》记载,当时巴县处于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的中心场镇有三个,分别是白碚镇、新市镇、梅溪镇。

1927年,出生于合川县(现重庆市合川区)的本地实业家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自此,这个仅3 000余户、15 000余人的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碚从一个穷僻杂乱的小乡场发展成为产业体系完整、市政秩序井然、文化教育发达的区域,实现了基层区域社会的良性治理。1936年,“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正式获准成立,峡防局这一地方自治组织转型为县域半行政机构。193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机构内迁至重庆,北碚因其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被划为文教机构迁建区。1942年,随着国民政府新县制改革的推进,实验区升级为具有县级完整行政职能的“北碚管理局”。可见,北碚建设是从一个小乡场区域开始,进而以县域为载体进行区域一体化建设的新型城镇建设,具有典型的城乡融合特点。

### 三、北碚城镇建设的特色历史经验

#### (一)借鉴而不照搬,基于山乡特点规划建设现代城镇

卢作孚在北碚开展的城镇建设以本地民生为核心。在北碚的规划建设过程中,他充分调研本地资源文化特点、开放借鉴而不照搬各类城乡建设经验、认真听取专家规划意见,重点突破与整体发展同步推进,创造出了新的增量和活力。

##### 1. 整体谋划,明确以民生为核心的发展定位

卢作孚开展北碚建设伊始就明确了系统性、整体性的民生定位。其建设目的十分明确,直接指向构建乡村现代生活。他提出,要以峡防局所在的北碚场为中心,经营整个嘉陵江三峡区域,定位于“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张守广,项锦熙,2016a:582)。在这个区域内,系统地实现“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张守广,项锦熙,2016a:606)的“乡村现代化”蓝图。

##### 2. 广泛吸收经验,编制本地化综合性规划

卢作孚对北碚场的建设做了认真的规划设计,其设计思路既基于对本地生态人文资源进行深入分析,又广泛吸纳其他有益经验。卢作孚一方面收集一切可运用的物资,对嘉陵江三峡地区进行全面的资源普查和社会调查;另一方面收集一切可供参考的资料,考察学习上海、南京、南通、青岛、大连、旅顺、哈尔滨等城市的城镇建设与实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和理念。通过考察,卢作孚对青岛的花园城市建设、哈尔滨的街道花木深表欣赏(张守广,项锦熙,2016b:245),并表示想要参考青岛的模式把北碚建设成一个大花园(周永林,凌耀伦,2001:466)。同时,他比较了不同地方新经营的“蛛网式市场”建设,即市场的规划布置“采蛛网式。蛛网的中心各有一广场”(张守广,项锦熙,2016b:248),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联通与辐射。虽然他没有详细介绍各地蛛网式市场的具体结构面貌与效果,但是从后期北碚市镇建设中网格交错的街道布局,以及市镇中布置的广场、会场、公园等公共服务场所,可以看到他吸收新的市镇

建设理念并付诸实践的效果。

1936年,峡防局改组为实验区。实验区署专门设立了乡村设计委员会,何北衡与卢作孚担任正副主席,委员会以“促进乡村新建设”为宗旨,聘请了文化、经济、游览、治安、卫生等事业的负责人及专家守尔慈(丹麦人、工程师)、黄云龙、邓少琴、张博和、卢尔勤、熊明甫等20余人担任委员<sup>①</sup>。委员会设计拟定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划分市区计划纲要》,持续推进街市空间的改造工作,“拆除市街间的关庙、禹庙、王爷庙、肖公庙、地主宫,扩宽道基,建成北京、广州、庐山、南京、上海、天津、武昌等新市街。改旧式房屋为一楼一底无檐牌面的新式楼房,安装玻璃窗,油漆门面”<sup>②</sup>。从峡防局时代的街道拓宽整治,扩展为逐步用新建筑、新街道、新房屋、新名称替代改造旧的市镇空间。1936年编制《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计划书》,从“教、养、卫”三个方面系统规划嘉陵江三峡地区;1941年颁布《北碚市区建筑规则》,明确各类建筑退距、高度、防火等要求。北碚后续的城市建设基本按此规划实施。

### 3. 立足本地特点,围绕市场开展镇街公共空间改造

北碚城镇建设不是照搬西方经验,而是以本地现有条件为基础,围绕乡民往来最为密集的中心市场逐步进行公共空间改造。旧时的北碚市场街道狭窄且十分脏乱,“街巷黑暗不见天日,因避雨的关系,同时也就避去了阳光。街上非常之肮脏的阳沟堵塞着垃圾和腐水……九口大尿缸摆在街旁,任何人都得掩鼻而过”(张守广,项锦熙,2016c:1154)。1928年春季,卢作孚亲自带领峡防局士兵进行街道测量、修正、拓宽,以及居民旧房改造等工作。根据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1929年编印的《两年来的峡防局》所记载,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北碚场不仅开辟了新的码头、整齐了街道、平整了土地、新建了道路,还对市场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定,明确了街道名称、重整了街道卫生、取缔了之前脏臭的尿缸、新修筑了公共厕所。此后,在峡防局官兵与峡区各场镇的镇长、乡长的合作之下,陆续推行了类似的市场空间整治工作,并在随后20年的社会建设中持之以恒地开展改进修整工作。

区域公共空间是民众公共生活的载体和生长土壤。通过对封闭脏乱的市场空间进行改造,使其成为更开阔、更方便进入、更容易获取信息与服务的公共空间。进而,峡防局围绕市场空间渐次修建了揭示牌、运动场、俱乐部、公园、图书馆、医院、会场、动物园等公共场所。到1934年,还有“峡防团务局所经营的乡村电话总机关,训练的学生和士兵,和新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其中生物、地质两个研究所,附设的一个三峡染织厂,一个兼善中学校并附设一个小学校”(张守广,项锦熙,2016a:604),这些文化与公共服务设施都建设在北碚市场周边。

①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编.1936.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工作报告.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印。

②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编.1940.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划分市区计划纲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印。

通过在市场周围兴建诸多现代文化和公共服务事业,构成以市场为核心的新的社会环境、形成新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些现代生产机构、文化机构、教育机构都是此前的北碚场没有的。它们通过一步步的社会改造融入了本地乡民的生活,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市镇生活新面貌,大幅度拓展了市镇公共空间的规模和内容。这些机构除在日常提供公共服务之外,还承担社会教育的功能。例如,“每年总有几个时期让人尽量进去参观,由办公、上课、研究的地方以至于寝室、厨房、厕所,都让他们参观完”(张守广,项锦熙,2016a:604)。于是,焕然一新的北碚场同时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生活培育场。随后,经过多年的有序拓展与建设,逐渐对周围乡村起到文化辐射、经济带动和社会融合作用。

#### 4. 不搞盲目扩张,注重对城镇空间的美化

北碚的城镇建设规模并未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快速扩张,而是结合本地资源特点、社会服务能力范围进行调整。1927年,卢作孚接手峡防局时,峡区治安范围划定的是嘉陵江航道流域范围的48个场镇。但是,到1936年实验区署成立时,虽然社会经济建设都已有起色,城镇建设范围却缩小到了以北碚场为中心的五个场镇区域,总人口60000余人,其中北碚镇人口约5000人(黄子裳,刘选青,1937)。这五个场镇中,文星镇、黄桷镇、二岩镇、澄江镇与区域中心的北碚镇之间的距离,都在当时交通情况下半天可达的范围内。至抗战大后方迁建、北碚管理局建立,建设范围没有再发生过大的改变。这样的城镇区域划定,一方面是基于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的可承受范围,另一方面是基于本地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区域,构成了当地市镇生活圈、文化圈与贸易往来圈。

卢作孚的北碚城镇建设还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改造。他以美学视角和系统化视野,将传统认知中的“穷山恶水”转变为“青山秀水”的生态空间。他提出“凡有隙地必冒街心花园”(张守广,项锦熙,2016a:583),将城市布局与自然有机结合。他在经费极度紧张的条件下,采取“众筹”募捐的方式建设北温泉公园、开发缙云山与戴湖公园。他参考青岛的建设实践,打造了北碚第一个街心花园;根据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的建议,在街道两旁种植法国梧桐和洋槐;还亲自带队规划建设了火焰山北碚平民公园(今北碚公园)。同时,在各个公园、码头、民众会堂等公共场所植入休闲娱乐、科普教育等功能,承载电影放映、植树典礼、运动会、演讲比赛等丰富的公共活动,实现了旅游、文娱、教育的多重功能。可以说,卢作孚的北碚城镇建设,离不开对北碚自然禀赋、民俗乡情等情况的充分把握。

#### (二)本地化县域实业体系建设

卢作孚的北碚县域经济建设强调实体经济,创造了以民生发展为核心的在地化实业体系,形成了本地生产、本地消费与本地就业的格局,重新构建了县域城乡社会的经济活性。卢作孚认为,开展社会建设不能依靠地方军阀等外部势力的资助,要建立非依附性的本地独立的产业体系,才能稳定地开展自主社会建设。

### 1. 以交通先行带动矿产资源产业化

北碚场此前曾因地处四县交界地区而土匪聚集。但是,四县交界地区也意味着地处交通枢纽。卢作孚通过交通运输建设,将内地闭塞劣势转化为交通优势,带动域内各项产业发展。

北碚建设开始之前,他就创办了民生公司,逐步打通了嘉陵江水路运输。北碚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有着200多年的开采历史,“然而远离江岸,肩挑背负,运输极为困难。社会上需要煤,民生公司需要煤,可就是运不出去”(周永林,凌耀伦,2001:526)。为突破这一困境,卢作孚在1927年8月即开始筹划成立“北川民业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28年11月动工,历时3年零5个月,分期修成全长16.8公里的北川铁路。建设起了从深山至江边的轻便铁路。有了铁路、水路运输的联合带动,北碚煤矿运力大幅度提升。不仅北碚各厂矿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而且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主要燃料基地。同时,盈利后的天府煤矿也成为北碚实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除北川铁路和民生公司航运外,北碚还兴建了多条对外公路,有效改善了当地的运输环境,从而激活了嘉陵江区域航道优势,实现货畅其流和全域资源的立体综合开发,激活了产业发展效能。

### 2. 统筹在地化资源,发展地方产业,建立全产业链体系

卢作孚通过直接投资、合股经营、支持本地中小实业企业的发展。他首先依托北碚丰富的资源、拓展社会消费需求,创办了天府煤矿公司和三峡染织厂,将采煤业和纺织业作为主要产业进行开发。又渐次创办或支持了火力发电厂、油气厂、机器厂、火柴厂、水泥厂、造纸厂、电灯厂等的发展,为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也促进和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地方产业的发展不能仅偏重于工业,还需要农业生产的支撑与商贸服务业的带动。卢作孚先后组织建设了西山坪农场、畜牧场,并完善了银行、宾馆等设施,逐步形成了全产业链体系。

可见,北碚当年就通过“培育本地产业和承接外部产业转移”增强了县城产业的支撑能力<sup>①</sup>,支持了县域的现代城镇化建设。本文认为,其经验在当代仍有参考价值:一是,通过引导不同产业的横向合作、同产业的纵向联合来建立区域产业链,降低了交易成本,内化了外部性风险;二是,在峡区计划引导下,鼓励本地产业通过股份合作、成立合作社、组织同业联合会、联合经营、产销合作等方式进行联合与资源整合;三是,通过企业之间彼此合作,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消耗与内部竞争、提高了外部市场竞争力、节制了资本在少数企业中过度集聚。

<sup>①</sup>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中央人民政府网. (2022-05-06) [2023-04-21].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5/06/content\\_5688895.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2-05/06/content_5688895.htm).

### 3. 创新金融工具,激活乡村实体经济

在深入调查农村社会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卢作孚认识到农民“最感困难的是农产品正在生长期,缺乏资金周转,最需要的是在这时候有低利贷款贷给他们,最需要的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张守广,项锦熙,2016c:1018)。于是,他便有针对性地成立了峡区农村银行和消费合作社。1928年10月,北碚农村银行成立,这是川渝地区最早在农村建设的现代金融机构(史辉,1988)。

峡区农村银行以“服务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经济、提倡农村合作”(黄子裳,刘选青,1937)为宗旨,面向峡区场镇提供金融合作服务,联通市镇供销网络,实行“五角可存,五元可放,十元可汇”以及“农产品抵押贷款”等优惠<sup>①</sup>。从农业生产和农民消费两个角度双管齐下搭建乡村金融体系,形成一个具有内生性的良性循环,保障民众消费,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他积极支持外地银行来北碚设立分行,以引入外生性的金融促进当地乡村经济的发展。这种直接服务于农民、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方式,起到了激活城乡经济潜力的作用,同时降低了金融产业经营风险。

### 4. 深化生态资源价值,以文旅产业融合城镇空间

卢作孚着眼整个嘉陵江三峡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1927年卢作孚就任峡防局局长后,在剿匪的同时想方设法地对当地自然资源进行深度开发。针对温塘峡边的一个破败古庙,他亲拟了就任峡防局局长后的首篇对外文告《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凌耀伦,熊甫,2012:50),从风景、古迹、出产、交通等方面对其独特的价值与多元化开发潜力进行了介绍。其功能设计可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不仅各得其所,还充满创新思维。

卢作孚依托温泉寺“众筹”建设了嘉陵江温泉公园之后,通过逐步完善旅游设施,促使北温泉成为当时各界人士来碚参观游览必去的“打卡地”和包括中国科学社年会等重要会议的举办地。20世纪30—40年代,他协调社会各界资源和力量,在缙云山上逐步开发了黛湖公园、植物园等复合型游览景观。不仅保护提升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还以创新性思维重新发掘其在文化、旅游、休闲、康养等方面的潜在价值,将缙云山地区打造成为当时知名的风景名胜区。进而,发掘开发出了各种副产品,比如修建温泉公园时衍生出的水利磨面和温泉挂面等,与当前强调“农文旅”融合及“三产化”转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 (三) 以人为核心的乡村现代化

卢作孚认为,开展乡村建设的目标是乡村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训练与社会组织的现代化(张守广,项锦熙,2016a:602)。对人的培养,以教育、科研的形式开展,其教育形式与组织方式不拘一格,而其内容则万变不离其宗,以构建“现代集团生活”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培育为根本导向。

<sup>①</sup> 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1929.两年来的峡防局.江巴璧合四县峡防团务局印。

### 1. 本地乡民的教育转化

卢作孚并未急于引进外部高水平人才,而是重视培养本地人进行社会建设。首先,他通过“化匪为民,寓兵于工”的方针策略,将“土匪”“兵痞”转变为地方建设亟须的人力资源。在剿匪工作中,卢作孚并非简单地依靠武力清剿土匪,而是鼓励土匪投降后通过培训获得一技之长,参与到地方经济建设中,将其逐步转化为生产劳动者。同时,他也对痞化士兵进行改造。他创办兵工织布事业,“买机头数架,令常队、练队士兵练习织布”,并设立工艺部加以管理,后来四川第一家机器织布工厂便由此发端(张守广,2014:131,247)。“如果有匪来了,我们拿起枪背起弹就是兵。把匪打了,放下枪就是良好的百姓,并且工业办好,不仅人人有红息分,队兵的家属还可以搬到这里来住家,帮我们些事”(张守广,项锦熙,2016b:126)。如此做法,同步达成匪与兵的转化,让社会不安定因素转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从而实现治安和建设双丰收。

其次,他重视培养本地青年,形成新生力量。从1927年起,卢作孚亲自主持,采取公开招考的办法,在峡区招收了500余名16~25岁的青年,先后组建起学生一队、二队、警察学生队,以及少年义勇队一、二、三期,并由曾就读于黄埔军校的卢子英担任队长,采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对青年们进行体质、组织、能力、思想等多方面的训练(卢国模,2010)。

### 2. 全域社会教育的开展

卢作孚认为“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去培育社会”,真正的教育不应限于学校,应与社会紧密互动而存在于四面八方,不仅要教育推进北碚建设,同时要把北碚建设成真正能够教育人的地区。因此,在扎实推动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校教育的同时,他在北碚全域大力推动民众社会教育。

1931年11月,峡防局正式成立以“办理民众教育、推行社会运动”为宗旨的民众教育办事处,并先后兴办了民众学校、民众俱乐部、民众会场、民众职业介绍所等机构,举办了露天教育、挨户教育、船夫学校、力夫学校、场期学校等活动,同时经常举办各种有示范作用的展览,以便随时能与民众联系。

与此同时,组织士兵“送书下乡”并建立“巡回文库”,让稀缺的图书在乡间流动起来,对更多人产生影响。为保障这些措施能落地且发挥更大作用,峡防局还自办媒体。1928年3月,卢作孚创办《嘉陵江日报》并担任社长。该报很快成为峡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平台与载体,除分送各单位人员外,及时在各场街和旅社等处张贴<sup>①</sup>,通过传播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峡防局职员则在民众会场川剧演出间隙教农民鼓掌,在新年放电影间隙向民众讲演公共卫生和市面上的清洁秩序,让处处成为可教之所,构建起真正的教育社会,整个城镇空间都成为教育的载体。

如此,教育不是为考试而教,而是与社会建设联手,努力与社会融为一体,也不是

<sup>①</sup> 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1929.两年来的峡防局.江巴璧合四县峡防团务局印。

等到经济发展后才能做,而是一开始就有所自觉且想方设法地转化为行动。

### 3. 引入外部智力支持,融合城乡资源

现代城镇中人的培养,基于本地但不局限于本地。卢作孚邀请各界名流来北碚进行公开演讲,包括李石曾、翁文灏、马寅初、任鸿隽、张伯苓、陶行知、梁漱溟、刘湘、陈立夫、太虚法师、田汉等各界知名人士和一些外籍人士。演讲内容包罗万象,既包括全国及世界形势分析,也包括新思想介绍和各地建设经验,还包括“杀白菜虫的方法”等实用技术。演讲对象既包括少年义勇队成员、峡防局工作人员、各类学校的教员学生,也包括北碚广大民众。举办地点则在民众俱乐部、民众会场等便于公众参加的地方,且演讲信息和内容也会及时在《嘉陵江日报》上刊登并流传到更广阔的公共空间。正是这些外来力量让原本封闭的山乡开放起来,使外部资源在导入乡村的同时,激发了乡村自身力量的发育。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水到渠成地出现了“三千名流汇北碚”的人才集聚壮观景象。

### 4. 以实用科学研究提升教育内涵品质

卢作孚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1930年9月,卢作孚在北碚创立了中国西部地区第一家民办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该院以“研究实用科学,辅助中国西部经济文化事业之发展”为宗旨,内设理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农林研究所四个研究所。科学院始终坚持“一切学术都应着眼或竟归宿于社会的用途上”,利用科研成果指导北碚的科学发展。

中国西部科学院既是一个研究机构,又是一个教育与服务机构。它在组织科研的同时,为学生提供实验学习、为民众提供科普教育、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成为北碚本地实用技术发展的活水之源。进而,为北碚其他公共文化空间承担教育功能提供支持。当年的北碚公园同时兼有动物园、植物园,这些机构统归中国西部科学院管理。民众因而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新鲜事物,实现娱乐与教育两不误。

1933年,卢作孚还邀请中国科学社到北碚召开年会,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北碚的资源发掘、科学教育与中国西部科学院建设。同时通过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提升了北碚的影响力与美誉度,为后续的人才引入与经验传播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期间,大量科研机构迁入,北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推动了西部地区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长足进步。

## (四) 城乡多元共治:推动基础治理现代化,降低治理成本

卢作孚灵活运用社会教育和培育民众组织,形成了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有效控制了城市治理与建设成本。通过社会教育,宣传、动员各界民众力量参与北碚的规划与建设。通过组织创新,卢作孚建立了民众可参与合作的管理制度。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蕴藏在民众之中的潜在社会资源。

### 1. 教育工作中的社会组织动员

覆盖全体民众的社会教育若想有效开展,组织应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低成本、能落地且能与教育、农业及各种建设事业结合的社会组织。

少年义勇队是当时北碚的一个重要组织。其在组织青年学习文化知识、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提倡“急公众难,造公众福”的社会服务,并通过接种牛痘、填沟、修路、淘河滩、植树等实践贯彻落实(高代华,高燕,2016:126)。这支经过严格训练的队伍成为北碚建设的先锋力量。有研究指出,正是在这些组织起来的青年的带动下,北碚“焕发了新的社会风气和面貌,同时以较低的社会组织成本实现了社区公共管理”(杜洁等,2017)。

除了少年义勇队之外,峡防局下设的各种事业或民生公司等企业组织,都是一个具有动员力和高参与度的组织。正是通过对各种“组织”的培育与灵活运用,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成本,还让各种资源实现最优配置,避免了几件事同步发展时常失败的困局。

## 2. 民众参与的社会化治理机制

北碚的“社会化”治理机制强调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视野。无论经济、文化还是教育都应发掘其社会面向,既努力将社会作为开展教育、组织和建设的可为空间,又在此过程中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实现社会参与和社会整合。正如卢作孚对北碚实践如何得以展开所做的总结:“促起大众起来解决码头的问题,道路的问题,桥梁的问题,卫生的问题,公共集会或游览地方的问题……不但是大众出力,大众出钱,而且是大众主持……(由这些具体的活动)训练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黄子裳,刘选青,1937)。

首先,1928年9月,经过一年的准备酝酿,峡防局在北碚场成立了市民自治会,并选举出市民代表和执行委员会,共同参与北碚的规划与建设,通过举办市民大会,问策于民。该机构主要负责北碚市场的安保、教育、建设、卫生、评判等事务(黄子裳,刘选青,1937)。许多建设方案不仅是在峡防局讨论,而且通过市民大会征求市民的意见(刘重来,2007:242)。通过建立民众可参与和合作的制度,实现治理变革。

市民自治会通过激发本地居民自身的积极性,形成了共同经营北碚市政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峡防局的治理成本,也很好地调动了民众改善自身生活环境的主动性。通过关注与本地居民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调动民众的参与积极性。自治会开展建设工作所需要的经费来自民众自筹,建设方案来自参与者的共同商讨,提高了民众认同度的同时降低了建设成本。具体事务由选举出的20位执行委员来协调指挥。同时,动员了社区内老人的力量,他们参与建设的讨论并欣赏支持建设工作的推进,强化了自治会工作的权威度与影响力。

其次,除了市民自治会的工作机制,北碚建设中还有很多灵活多样的社会动员工作。例如,通过北碚建设的各种档案,不仅可以看到北温泉公园和中国西部科学院建设中的“众筹”动员,还能发现峡局职员减月薪储作资本去上海购买染织工厂机器的义举<sup>①</sup>。可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正是如此充分的社会

<sup>①</sup> 江巴璧合特组峡防团务事业进程一览. 峡防局1934年刊,北碚图书馆藏。

动员与广泛参与,解决了当时贫困地区建设资源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卢作孚还通过持续有效的干部训练,让行政人员融入社会化治理。例如,他在嘉陵江三峡实验区署纪念周会上要求机关人员“不要专门坐在办公室里弄笔墨,尽量减少办公室的人数,每个人要多到社会去活动”(凌耀伦,熊甫,2012:337)。即使必要的室内办公,也要求集中在大办公室,因为其“便于联络、便于照料全部、便于提起办事精神”<sup>①</sup>。如此,“社会化”治理不仅突破了行政化可能引发的官僚化顽疾,也有助于本地乡民主体和其他社会参与主体真正发挥作用。

随着北碚各界的社会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各种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灵活运用,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治理成本,还优化了资源配置,形成了多元共治的局面。

#### 四、结束语

20 世纪上半叶,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实践是寻求城镇建设的有益探索。北碚城镇建设的特点在于,跳出了大城市发展逻辑,立足本地资源文化条件科学规划、以民生发展为核心、以区域实体经济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参与为动力,通过乡土社会与外来现代理念的融合创新,形成了在落后山区进行现代城乡建设的典范。

##### (一) 以民生发展为核心,探索乡村建设路径

卢作孚始终以民生为核心,从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关系,来考虑社会建设与发展问题。他认为,如果乡村建设事业没有和城市发展相协调,必然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培育现代人、形成现代集团生活。北碚城镇建设的所有工作都以此目标为中心。

他借鉴但不照搬外部经验,不以昂贵的外在现代设施建设为落脚点,不盲目推动城市化扩张建设。而是从本地特点和需求出发,合理规划城镇范围、注重实体经济的产业体系、同步发展的公共精神文化、不追求少数人精致生活的普惠现代生活。

##### (二) 立足当地的区域一体化规划设计理念

卢作孚理想的乡村建设图景,是集生产、生活、文化和游览功能于一体的。北碚建设融合了“上海的现代工业技术,德国建设青岛的城市经验,日本建设大连的经验,以及张謇建设南通的经验”(张瑾,2003:324),并借鉴田园城市理念,提出将北碚建设成为花园城市。结合当地已有资源条件,通过采取小规模、渐进式的方式推进规划实施,将长远规划目标分解成具体实施计划,构建了系统的建设路径。

##### (三) 通过在地化实体体系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卢作孚的乡建实践通过构建循环共生的产业体系,推动城乡产业融合。他首先通过组建民生公司、建设北川铁路,以交通建设带动煤炭等产业提升。随后,整合煤炭等本地资源,打造支柱产业;创办火力发电厂、油气厂等,为生产和运输提供能源,

<sup>①</sup> 黄子裳,1937. 我们的生活. 四川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 北碚(9,10):95.

实现北碚由传统农业体系向现代工业体系转型。同时,通过整合温泉等自然生态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先后创建嘉陵江温泉公园等,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逐步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共生的本地特色产业体系。进而,开发服务于乡村实体经济的金融业,不追逐金融化泡沫,从而激活地方经济、撬动城乡资源的融合转化,实现城乡互促发展。

#### (四) 社会教育、科教兴城,以具有社会活力的文化中心培育现代生活

卢作孚坚持将实用教育和科学研究转化为推动人才提升、社会发展、民族进步的动力来源,倡导建立科技发展 with 地方经济相互促进的实用型创新体系。通过兴办民众学校、民众俱乐部等机构,举办露天教育、船夫学校等活动,形成大众教育氛围;通过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整合学术研究、生产研发、科普教育等,带动西部地区科学发展与社会长足进步。

#### (五) 民众组织,社会参与,探索共治共享的社会化治理模式

卢作孚在北碚乡建试验中从基层着手,通过多元化社会参与实践,训练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使其参与各项社会建设,推动城乡治理能力的提升。这与其对“社会”的重视及积极有效的“社会化”努力分不开。北碚的各项建设既要服务社会,也是“替社会找出路”,建设力量来自社会,收益自然也由社会共享。卢作孚以社会动员和公益集资等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民众活动,培育现代集团生活,将乡绅、农民和商户转变为具有新知识、新道德、新生活的现代人,参与城市的各项建设。进而通过参与乡村建设活动,实现了政府、公众对城乡发展的共建共管,促进社会福祉、公共利益的普惠化。

总而言之,卢作孚的北碚建设经验兼具历史创新性和时代延续性,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其以现代人和现代生活为核心的乡村建设理念,对当前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打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空间,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具有借鉴价值。

#### [参考文献]

杜洁,张兰英,温铁军,2017.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的本土化——以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为例. 探索(3):138-143

高代华,高燕,2016. 高孟先文选.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子裳,刘选青,1937. 嘉陵江三峡乡村十年来之经济建设. 北碚月刊(5):1-35

凌耀伦,熊甫,2012. 卢作孚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重来,2007. 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卢国模,2010. 八十年前的北碚少年义勇队. 红岩春秋(2):64-66

卢汉超,2009. 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半城半乡——论中国城乡关系中的小城镇. 史林(5):1-10

珀金斯,1984. 中国农业的发展(1936—1968年). 潘纪一,宋海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施坚雅,1998.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史建云,徐秀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史辉,1988. 卢作孚创办的北碚农村银行. 四川金融(6):44

张瑾,2003. 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 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 重庆出版社

张瑾,2005. 卢作孚“北碚模式”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变迁.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00): 145 - 161

张守广,2014. 卢作孚年谱长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守广,项锦熙,2016a. 卢作孚全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张守广,项锦熙,2016b. 卢作孚全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张守广,项锦熙,2016c. 卢作孚全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赵冈,2006. 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北京:新星出版社

周永林,凌耀伦,2001. 卢作孚追思录. 重庆出版社

## Modern Exploration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Local Urbanization

—The Characteristic Experience of Lu Zuofu's Beibei Model

DU Jie JIA Ying WEN Tiejun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e necessity of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megacities and deep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New urbanization is a Chinese-style urbanization path that differs from the Western urbanization model, and it is inherent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local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century-long history of urba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times, there are many valuable exploration experiences. Among them, in the 1920s and 1930s, local elite Lu Zuofu carried out over 20 years of rural construction practice in the inland mountainous area of Beibei, Chongqing.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rural modernization” centered on people’s livelihoods, he embarked on a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at combines modernity and localization, known as the “Beibei model”.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Beibei from four aspects: urban planning,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modernization of people, and urban-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Beibei model breaks away from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Western megacities, with people’s livelihoods as the core, and has loc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local society and foreign modern concepts, it has formed a model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in underdeveloped mountainous areas. Its experience is fully embedd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s century-long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exploration, and it is also an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ese-style counties.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ill holds significant inspiration for today’s related work.

**Keywords** New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eibei mode